

重温精神与信仰的力量

□杨献平



马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再次阅读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扎实的叙述与生动的刻绘之中,所领略到的是一种来自觉醒的、民间的、文学的往事气息,字里行间蕴含的是由强大的精神与信仰铸就的非凡力量。虽然7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和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这部小说当中的人物依旧是鲜活的、有灵魂的,从诸多的“吕梁英雄”身上,感受到的是那种强大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击日寇和伪军的斗争中,体现出了那种天然的、不断增强的、不断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方法与策略,令人身临其境。阅读之间,仿佛再度走入了那个充满赤子之心与热血激荡的特殊历史时空。

文学艺术是要唤醒人、鼓舞人、启发人、教育人的,同时也要对世道人心以及人在各种极端环境中的表现进行深刻的状写与发掘。在战火纷飞、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文学艺术作品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唤醒、鞭策与激励,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其中一部分沿着平绥、同蒲铁路,占领了绥远和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抗日,并展开行动。由贺龙元帅率领的八路军120师广大官兵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长驱,奉命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堪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此时的吕梁山区,抗日战争的形势异常艰险和严峻,面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凶残无耻的日

军,人民群众有心反抗,但不得方法要领,后在武工队的领导下,运用我们党对敌斗争策略,民众得以唤醒,自发地组织武装力量,寻找真正的抗日救国力量,把自己的生命和全部才智都投入到了与日寇和伪军的伟大斗争当中。

《吕梁英雄传》是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忠实而又艺术地记录、塑造了那个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群众觉醒之后,舍生忘死,加入到打击和驱逐日寇的伟大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和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吕梁英雄传》的故事背景主要设在康家寨,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普通北方乡村,深处吕梁山区,是千万个中国乡村当中的典型代表。《吕梁英雄传》一书中的主要人物雷石柱、武得民、孟二愣、张勤孝、周五孩、马保儿、李有红,以及张有才和张有义兄弟等,他们都是来自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人物,经由作家马烽、西戎对诸多民众抗日事迹材料与新闻报道的精心萃取和艺术加工,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在当时激起民众追求国家民族独立和实现美好理想的信心的长篇力作。书中的众多人物,本都是安分守己的乡野农民,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传统,他们也许懦弱、守旧,甚至有些自私,可在国破家亡、日寇猖獗的非常时刻,一个个挺身而出,同侵略者展开了机智英勇的战斗,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的“挤敌人”的方针指引下,以雷石柱等人为代表的乡民自发组织起民兵队伍,在武工队武得民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积极而又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对敌斗争。

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实际环境中,想尽一切办法挤压日寇和伪军的“空间”,无疑是一个

实事求是、“功效”巨大、见微知著的有效的的方法策略。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是我党延续至今的一个优良传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无疑是一个震古烁今的伟大创见。《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的根本出发点,一是真实、深刻、全面地记录和反映吕梁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二是运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宣传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斗争方式的有效,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小说中的雷石柱,是一个普通而又老实的青年农民,他身上流淌的,是中国农民血液中的朴素的忠义与正直。起初,在日寇扫荡与屠杀之中,他原本病殃殃的,可在武工队武得民的开导与教育下振作起来精神抖擞,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本村组织孟二愣、李有红、周五孩、张勤孝等人,形成了一支有效的对敌力量。他们既要面对武器装备精良且凶残的日本军队和伪军,还要与以“桦林霸”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雷石柱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诸多的闪光点。当他好吃懒做的老丈人吴有才为了得到日伪军的赏赐,铤而走险去到康家寨,骗自己的闺女回来卖掉换大烟钱的计划失败,再趁机下毒,被李有红等人骗出汉家山。抓到康家寨的时候,面对这个差点要了自己命的老丈人和抗日的“绊脚石”,雷石柱并没有采取有仇必报的惯常方式,而是释放了吴有才,尽可能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同时也由此唤醒和教育了更多的像吴有才这样的“汉奸走狗”。这样一种悟是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使雷石柱对做好抗日斗争有了一个更全面和长远的认识,并且能够很好地独立开展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在针对“桦林霸”的斗争中,雷石柱等人采取的方式也是怀柔的。但“桦林霸”与其小妾,多次采用蒙骗、给好处,甚至“美人计”的方式,从个别斗争意识不强的民兵口中套取情报,作为投靠日本人和伪军的筹码。如此一系列的敌对斗争和人民内部斗争交织在康家寨,也使得康家寨的抗日形势更加复杂。

在任何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总是有无数的人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去勇敢献身,用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救国救民的理想,投入到伟大的斗争当中。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卖身投靠,成为敌人的帮



凶。这在《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当中,也有极其明确而深刻的呈现。康家寨的“桦林霸”及其一干利益纠结者,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吕梁英雄传》所书写的,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抗日斗争环境。这也是当时抗日斗争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一种文学手法,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马烽和西戎没有采取“一面倒”的叙事方式,而是充分而又艺术地将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人心的复杂性揉入其中,使得这部小说丰富而立体的,给人以切实的鼓舞和教育。民兵康有富原是“桦林霸”的长工,在“桦林霸”的威逼利诱下,无奈说出了“康家寨”与周边村民民兵之间的联络暗号。这个康有富的人物形象,可信性很强,同时也反映了在农民抗日武装群体当中人员组成的多样性。

以雷石柱、孟二愣和武工队武得民等人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日趋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之下,自觉团结起来,根据上级指示,在缺少枪支弹药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主动寻找敌人空隙进行伏击,号召和带领广大民众学习炸药提取和地雷制作技术,并在实战中不断得到检验和提高,使得民兵力量不断扩大,战术上也获得提高。与此同时,运用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有效地做

好了宣传和教育改造工作,团结了更多的抗日力量,使得吕梁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和强大。由此可见,《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一个艺术品,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宣传“武器”。

我们党的“文武”力量并驾齐驱,形成张弛有度的“武器”,其强大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威力和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成为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夺取全面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1945年,周恩来领队前往重庆谈判,将已经出版的《吕梁英雄传》上册也带到了“国统区”,各大书局再版后,在全民当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时许多对敌后抗日不了解,甚至有偏见和误解的各界人士,读到《吕梁英雄传》后,改变了对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的看法。这就是“文”的力量,更是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的真实检验和实际效果。

《吕梁英雄传》反映和体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乡村民众从麻木到觉醒,从自发到融入抗日大潮的壮阔历程,运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其不断进步,增强对敌斗争经验,思想觉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等生动事例,通过全面有机的串联和艺术加工,使得中国共产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历史得以展现和流传,成为“红色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当然,除了对雷石柱等人的艺术刻画之外,《吕梁英雄传》还刻画了刘二则、张忠、吴秀英、孙生旺、辛在汉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命运和选择尽管不尽相同,但处在大时代之下,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也都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同胞,是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父老乡亲,其中大多数在党的政策教育下改过自新,站在了人民一边,站在了时代最正确的一面。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也体现出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卓越性。

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离不开作者所在的具体时代及其熟悉的环境,尤其是作家对于时代的本质性穿透与理解。《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红岩》等红色经典作品一样,都是反映时代剧变的深刻之作,也都是真正地深入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杰出文学创造。在阅读《吕梁英雄传》过程中,笔者感受最强烈的,是那种无所不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那些用党的先进理论和政策武装起来的万千民众,在生死考验面前所呈现出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强大的政治信仰和精神意志在今天依旧特别能够感染人和鼓舞人。

“我用整个生命烧着写它”

□晓风

1949年11月6日,北京华文学学校。客居在这里的胡风写下了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篇《欢乐颂》的第一行:

时间开始了——
这时他心潮澎湃,几个月来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在他心中燃烧着,一定要设法用文字表达出来,让世人也能感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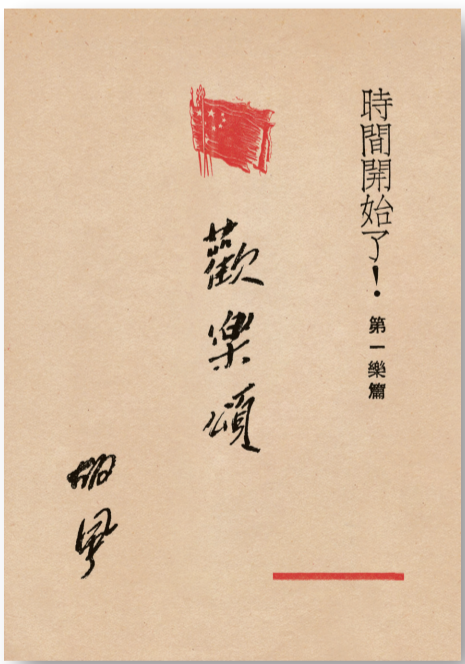
1949年初,胡风从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绕道香港来到了东北解放区。这里的人民热情奔放,他们生活和建设在解放了的国土上,艰苦而充满自信。这一切都给了胡风全新的感受,受到极大的鼓舞。3月,他随中共中央统战部进北平,途经河北李家庄,见到久违的周恩来同志,有过亲切的交谈。之后,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兴奋而自信地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路”。

到北京后,在与新老朋友们见面言欢的同时,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办工作。7月1日晚上,在先农坛举行了三万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的大会,正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们全都出席了。会刚开不久,狂风暴雨来到,雷声与闪电交加,但大家巍然不动,歌声大作,湿透了红旗,在风中越发显得鲜艳。胡风虽然不会唱歌,但此时体验到了生平最大、最强烈的欢乐,在心中唱起了幸福的颂歌。此时,毛泽东来到了会场,大会便如沸腾的大海一样,欢声雷动。

回想起“七一”那晚令人难忘的场面,他接着这样写道:

好猛烈的狂风暴雨
好甜蜜的狂风暴雨
夹着雷声
飞着电火
倾天复地而来了
被你吹着淋着的
是三万个战斗的生命
是三万个战斗的原子
我们
用歌声欢迎你
用欢笑欢迎你
用舞蹈欢迎你
只有你这响彻天地的大合奏
只有你这浸透皮肤的大洗礼
才能够满足这神圣的生日所怀抱的大欢喜……

掌声爆发了起来
乐声奔涌了出来
灯光放射了开来



礼炮像大交响乐的鼓声
“咚!咚!咚!”地震响了进来
一瞬间
这会会场
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
一片声浪的海
一片光带的海
一片声浪和光带交错的海
欢快的生命的海

到了这年9月,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住在华文学学校。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讨论以及政协各法令草案的讨论,认真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

他的日记里记载的主要日程有:
1949年9月9日:“到勤政殿参加讨论共同纲领的小组会,由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十分”;
1949年9月21日:“夜七时,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毛主席致开幕辞”;
1949年9月29日:“下午三时,开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等”;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三时,开最后一次会议,选举。闭会前到天安门举行烈士纪念碑奠基礼。闭会式”;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

在10月1日那一天,胡风亲耳听到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历史性的宣告:“中国人民

从此站立起来了!”亲眼见到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和丁玲等作家朋友们在第一面国旗下的合影,兴奋和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胡风从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参加了共青团。在“五卅”运动中,他奔走于南京街头的游行示威队伍中,对工人兄弟做宣传和鼓动工作,声援上海的工人运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进一步受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中国左联东京支部的一员,后又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因从事反战运动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后,在鲁迅先生的引领下,致力于辅助青年作家的社会活动和革命文学实践,为左翼文艺运动尽心尽力。虽然他的日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未能转成中共党员,但他一直按照党的指示从事文艺活动,自抗战期间起,更是自觉接受周恩来中共南方局的领导,编辑《七月》和《希望》,使之成为了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支文艺力量。几十年一路走来,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今天,祖国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领袖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时代的最强音。于是,他在《欢乐颂》的结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响惊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立起来了!”

在创作的大部分时间内,他都处于一种燃烧不已的精神状态里面,耳边总好像有宏大的交响乐在奏着,和音乐家作曲时无异。因此,在完成时,他以“乐篇”来命名他的这几章长诗。

整个长诗共分五个乐篇。
第一个乐篇《欢乐颂》是整个长诗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一篇。11月6日开始写,11月12日校改完成,11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二个乐篇《光荣赞》是献给他曾接触过的几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包括劳苦了一生的他的母亲。他深情地讴歌了她们,向她们致敬。原定的第三

乐篇当时未能完成,直到他晚年,才将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几首短诗补入,题名为《青春曲》;在第四乐篇《安魂曲》(后改名为《英雄谱》)中,他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怀念起曾和自己一起战斗过并给自己以力量的师友们——杨超、扶国权、宛希俨、丘东平、小林多喜二和鲁迅先生,正是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第五乐篇《第二个欢乐颂》(后改名为《胜利颂》),则充分反映了开国大典时的欢乐气氛。

诗人当时写作的精神状态,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而从那些日子里写给妻子梅志的家书中我们更能直接感受到:

11月14日:“大前天晚上,我写了一首四百多行的诗。写着它,我的心像海啸一样汹涌。多么幸福的时间!要尽可能早点给你看到。两个月来,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活在一股雄大的欢乐的音乐里面”;
11月16日:“第四章也恐怕不容易,写十月一日的大会,要写出别人感不到的神圣而美丽的东西。我亲爱的M,我希望有力气写完它,向这个时代献出我的一瓣心香。亲爱的,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每天,我的心总有些时候像怒海一样沸腾。烧得好幸福又好难受呵”。

11月20日,诗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他在信中写道:“这一章今天刊出,寄上。自己看过,下午有朋友来,谈过,此刻,一股雄大的热情使我激动得发抖,连字都写不好了。亲爱的,好冷呵!你看看,把读过的感觉告诉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它的。还要写下去,这几天就整天在感情底纠结里面。好幸福又好难受呵。”
几天后的11月26日:“《欢乐颂》……就几个消息看,激动了读者。我们精神上的朋友们,感动得很,感到了幸福。这里面包含着雄大的丰富的旋律……,里面蕴涵着多少宝贵的东西呵!第二乐章是歌颂人民(祖国)的,是另一种。如第一是大海,第二就是长江。这里面有悲苦的东西,有悲切的东西,有甜美的东西,有雄壮的东西。”

在1950年1月1日的新年祝福中,他更为详细地诉说着自己创作时的情景:“全部由五个乐篇(交响乐)组成:(一)欢乐颂,(二)光荣赞,(三)青春颂(四)安魂曲(五)欢乐颂。昨天写完的是《安魂曲》。想在半个月以内写好。《青春颂》,我想在路上写,或者回上海后写。现在还只有一股血流藏在心里,我不知道会现出来一些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已经有了一个头,也就是说,我打开了那一组音流底源头。它是一片美丽而欢笑的原野,一个高耸起来的快活迷人的光柱,立在正中,使读者受得住前面和后面雄大



胡风

的东西。……两个月以来,非不得已不出去,也不希望有人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除了大约半个月中间,咳嗽和情绪不动以外,差不多总是在激动中,有时候气都喘不过来,只好想法逃出去(一个人是无法休息的)。这个劳动热情,使我痛苦,但却更使我幸福的。……两个月以来,我有时睡得很少,有时吃得不多,但除了有时感到疲劳以外,精神一直是好的,我好像和整个世界整个未来活在一起,我心里好的美的神圣的东西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觉得自己更纯洁更年青了。”

从1949年11月6日起至1950年1月13日止,短短两个多月,胡风完成了除《青春曲》外的四个乐篇,将近四千行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在诗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该诗真正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一经发表,就得到极大反响。这之后,在很多的会议场合中,都有人朗诵《欢乐颂》,也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十月》和《星》上刊出,介绍给广大的苏联人民。

上世纪90年代,绿原先生曾在《(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中这样提到:“不妨从全国范围回顾一下,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表现的力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始了》相当的作品又未必是很多的。”

由于种种原因,《时间开始了》的各乐篇,只在50年代初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并未能完整集结出版。1979年之后,经过数次修订原稿,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成《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和(狱中诗草)》一书,于1987年3月出版。但此时作者已辞世近两年,终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全诗出版。